

族群身份对清朝政权性质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一方面，藏人有关“汉地”（相对“藏区”而言）的历史观念，导致藏文献的书写者继承了对满人统治区的“བྱ་ནག”的印象；另一方面，满人统治者的种种汉化行为（尽管并未影响藏人对满人的族群身份的识别），则可能使得藏人的这种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时空脉络，藏文献的书写者建构出了他们对于清朝政权的“བྱ་ནག”化认识。

【论 文】

贡纳尔·雅林“四卷集”文献研究

武红霞¹

摘要：瑞典学者贡纳尔·雅林搜集、整理了来自我国新疆的大量文学资料并将其译介到国外，产生重大影响，四卷集《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是其田野调查成果。该书记载了来自田野的大量维吾尔民间故事、传说、诗歌、谚语、谜语等，是珍贵的文学文本，反映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在维吾尔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以《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为研究对象，剖析文化他者雅林如何搜集记录并研究维吾尔族民间文学。肯定该物质文本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阅读材料，另一方面也为学者提供了跨文化交流的资料。

关键词：贡纳尔·雅林；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他者；跨文化交流

瑞典隆德大学图书馆的贡纳尔·雅林藏品有大量关于新疆和维吾尔族的图书资料，这些资料得益于瑞典学者贡纳尔·雅林的贡献。其中，既有关于维吾尔族语音的资料、也有关于维吾尔族人商业、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图书。在雅林藏品中，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占有较重要的位置。文化他者雅林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方面不仅搜集了大量手稿并将其译介成英文推介到国外，而且对维吾尔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意义重大。四卷集的《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则主要是雅林在田野调查、忠实记录、严谨的转写与翻译等基础上对来自塔里木绿洲的普通维吾尔人进行访谈后获得的真实可靠的成果。对了解并研究维吾尔族语言和民间文学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素材。

一、文化他者：学者与探险家

新疆古称西域，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也是现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地区。新疆丰富的多民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民间文学为作家文学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多元文化交汇的新疆吸引了国内外人士的关注，神秘、异域风情更增添了人们对它的想象。近代史中，伴随中亚地理考察热的出现以及国际东方学的兴起，很多外国人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陆续进入新疆进行探险考察，由此出现了新疆探险高潮。来疆探险家身份不同，文化各异，不少人都将眼光放在塔里木绿洲南部并展开其探险考察活动。

众多探险家就自身的考察活动进行了书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系列丛书，既是西方认识古代西域和当时新疆所形成的文本，也是对那个历史时期的一个总结性回顾。如福赛斯使团成员亨利·特罗特的《出使叶尔羌和喀什》、贝柳医生的《克什米尔和喀什噶

¹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文学）



尔》；A·N库罗帕特金的《喀什噶利亚》；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走向罗布泊》；别夫佐夫的《别夫佐夫探险记》；扬哈斯本的《帕米尔历险记》；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格伦威德尔的《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奥勃鲁切夫的《荒漠寻宝》；橘瑞超的《橘瑞超西行记》；阿尔伯特·冯勒柯克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古代和田》；伯希和的《伯希和西域探险记》、《伯希和库车地区考古笔记》；马达汉的《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拉铁摩尔的《进入天山》、《内陆亚洲的边疆》；尼尔斯·安博特的《驼队》等图书。出于不同的目的与个人关注点的不同，各国探险家对新疆及其社会状况进行了或详或略的描述与介绍，为读者了解新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和丰富的信息。

同样是入疆考察的外国人，瑞典学者雅林则与其他人不同，他主要对维吾尔族的语言和民间文学以及社会状况进行了研究。为了完成博士论文，雅林曾于1929年进入塔里木绿洲南部的城市喀什，他搜集了大量维吾尔族民间文学资料，于1930年回国。1935年，学者雅林欲再次前往新疆进行田野调查，但由于新疆道路被封，因而他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斯利纳加七桥对来自和田、叶尔羌、喀什噶尔的商队人员进行了调研，并完成了四卷集的《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回国后的雅林致力于维吾尔族研究，将搜集的部分资料整理后翻译成英文并出版，向国外介绍了我国的民间文学。如《喀什噶尔文学文献》、《来自中亚的一个高大的故事》、《无贼城等维吾尔传说研究》、《水果竞赛》、《莫恩收集的维吾尔语谚语和俗语》等。其中，来自塔里木绿洲南部的四卷集《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中有三卷都是记录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传说、谚语的，对研究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具有较大的价值。

不同的外国人带着不同的目的出现在新疆，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探险家、有的是军事家、有的是间谍、有的是植物学家，他们中很多人都留下不少关于新疆的科学考察报告、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论文、散文和珍贵图片。相对于新疆这个他异性的“他者”而言，一些探险家在其表述中自觉不自觉的表明了自己的“东方主义”态度，认为维吾尔族是边缘的低级的，是低于西方的“他者”，显示出自己“欧洲主义”的优越中心观。如别夫佐夫写道叶尔羌当地人居住处又臭又脏，其卫生条件极差；尼尔斯·安博特用“恶臭”二字形容和田纺织作坊；马达汉笔下贫穷落后的巴里坤、懒惰的撒尔特人等。这些具有评价色彩的词不仅显露了探险家的一些真实想法，而且反射出探险家以自我的文化背景为依据做出了他们“自认为文明”的主观性判断。

反观雅林，他不仅以平和的态度来看待新疆，在其他者书写中，雅林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理解并记录而不是随便删改或贸然评论。并且他在著作《重返喀什噶尔》中写道：

新疆自治区的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的历史与中国历史是分开的，换句话说，这并不意味着新疆有自己独立的历史。新疆确实有自己的历史，但是从古代以来，新疆就一直是新疆疆域中的一部分。如果你参观了乌鲁木齐的博物馆，就会知道这个观点得到了很清楚的表达和证明。而乌鲁木齐地区的学者在做关于新疆历史的报告时也清楚地陈述了这个观点。¹

这是东方学者雅林尊重我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要表述。不仅如此，他一生都在关心中国，研究新疆，具有深厚的中国情怀，这些值得关注并研究。

二、他者书写：田野调查与科学记录

与探险家对异域风情的叙述不同，雅林则更关注与人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学，尤其是与民众密切关联的民间文学。某种程度上，雅林关注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符合人类学家对“他者”文化的研究。我们所讲的“他者”不仅仅指向与自己不同的人群(others)，更多的是指向与自己不同的

¹ (瑞典) 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译，雅林文集 重返喀什噶尔[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037.



文化(other cultures)。换句话说,我们所主要关注的不是作为人群的他者,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Cultural otherness)。¹瑞典学者雅林关注作为“他者”的维吾尔族与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在1935年运用田野考察与访谈法,以来自塔里木绿洲南部的和田、叶尔羌、喀什的商队人员为口述调查对象,用文字记录维吾尔族人口耳相传的故事,将储存于维吾尔族人大脑中的脑文本转为可以直接阅读和分析的物质文本,具有文献价值的同时也易于人们阅读、保存和流传。

(一) 田野调查

1929年-1930年,雅林为完成博士论文,远足新疆前往喀什并在喀什居住近一年,他学习维吾尔语的同时也了解当地人的社会生活。五年后的春天,雅林欲再次前往新疆进行田野考察,但因道路不通,于是临时改变田野考察地,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斯利纳加七桥对来自和田、喀什、莎车、库车、固玛(今皮山)等塔里木绿洲南部城市的维吾尔族商贩、驼夫等人进行了访谈,随后整理成四卷集的《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并出版。如果说20世纪初北大发起的歌谣征集运动表明国内主流学界开始关注民间的话,那么雅林对塔里木绿洲南部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可以说是一个外国学者在新疆对此次歌谣活动的呼应与扩展。特别是《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的前三卷,这三卷书中记录了37个维吾尔民间故事传说、45个谚语、192首诗歌、18个谜语、6个LaiLai²、3个绕口令。多数民间文学研究者以已有的民间故事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雅林则不同,他直接深入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土壤,对维吾尔族人进行调研并用维吾尔语记录了大量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获得了丰硕的田野成果。在田野调查中,雅林既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访谈者,同时也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文本记录者,他做到了田野与文本的互动。

雅林在20世纪中期搜集的大量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中,不仅有传说、故事、诗歌、谚语、谜语、还有关于维吾尔族的一些骂人话,可以说雅林扩展了北大歌谣运动的搜集范围。而1935年的资料搜集地——斯利那加七桥可以说是意料之外,但他所搜集的四卷集的《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又可以说在意料之中,这说明了一个学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持久耐心和毅力,更表明了雅林对塔里木绿洲文学的热情。在四卷集的《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中,雅林在每一卷卷首的前言中都介绍了所记录文学作品的调研地、调研时间、文学作品归属地、讲述者等。针对讲述者,雅林记录了讲述者的姓名、性别、民族、年龄、身份、职业、受教育程度、家乡等信息,为读者提供了文本搜集与来源的详细信息。而对于作品获得地、作品提供者的年龄与身份等重要信息,雅林也做了介绍,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空间。通读四卷文集,读者可以得知为雅林提供素材的多为塔里木绿洲南部的维吾尔族人,因此,该部作品主要反应了塔里木绿洲南部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及其他社会状况。

《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的第一卷主要是关于和田和莎车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由7个传说、15首诗歌,8个谚语组成。这部分雅林的调研对象分别来自和田和莎车,均是25岁的维吾尔族男人。来自和田的两名男性为Alim Akhon和Hashim Akhon,来自莎车的男性名为Hamid Akhon。这三个调研对象既是农民、也是商队中的驼工。和田人Alim Akhon讲述了5个传说,Hashim Akhon讲述了1个传说、8个谚语、7首诗歌;莎车人Hamid Akhon讲述了1个传说和8首诗歌。

第二卷主要是来自喀什、Tashmaliq、库车等地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该卷中,雅林说明了位于喀什西南部的绿洲村落Tashmaliq的地理位置,对讲述者进行了细致的介绍。第二卷记录了15个维吾尔族传说故事,而这15个故事由不同的喀什维吾尔族人讲述。其中,《巴依和依禅的传说》和《国王提出三个问题的传说》的讲述者是生于并居住于喀什的35岁的Yussup Hadji,他没受过教育,是驼工。名为ABD ul-Aziz的讲述者讲述了《一个小偷的传说》和《毛拉坠入爱河

¹ 黄剑波.作为“他者”研究的人类学[J].广西民族研究,2002(4):11.参见原文William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London: 1977.

² 雅林认为LaiLai的意思晦涩难懂,很难翻译。笔者认为LaiLai是维吾尔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学体裁。



的传说》、3个有关毛拉·纳斯尔丁的故事、30首诗歌、11个谜语，他是一名17岁的未受过教育的少年，生于并长于喀什，是富人巴依的雇工。30岁的Rose Akhun讲述了14首诗歌，他不识字，生于并居住于喀什，做为雇工为富人巴依服务。40岁的妇女Arzu Khan来自喀什，是富人巴依的仆人，她向雅林提供了15首诗歌，8个谚语。40岁的驼工Khoshur Akhun为雅林讲述了16首诗歌，他出生于喀什并在喀什居住，是个文盲。29岁的Rabbie Khan是一名来自喀什噶尔的目不识丁的妇女，她向雅林讲述了第四个传说，4个毛拉·纳斯尔丁的故事、34首诗歌。30岁的喀什人Mahmud Khan是个驼工，没有受过教育，他讲说了1首诗。喀什教师Hassan Akhun是文化人，他讲述了1个谚语和3个绕口令。喀什人ABD UL-Qadir是一名理发师，作为资料提供者，他向雅林讲说了2首诗歌。出生并生活于Tashmaliq的Ismail Akhun是个30岁的驼工，他不识字，讲述了2个故事，32首诗歌及其他东西。裁缝Hassan Akhun来自库车，大约30岁，不识字，提供了1首诗歌及库车的自然地理面貌等信息。

除以上讲述者外，第二卷中还有两个长期居住在喀什的外国人，他们向雅林提供了维吾尔族民间传说和谚语等。35岁的Abdullah Djan出生于纳曼干¹，但在喀什生活多年，是个有知识的人。Abdullah djan向雅林陈说了3个传说，1首诗歌、1个谚语。雅林写道：第13个故事是他最先记录的，Abdullah Djan几乎保留了喀什噶尔方言的每个细节（比较重要的特殊例子被放在注释中）；Abdullah djan在讲述第14个故事时，不由自主的陷入自己原来的方言中，混杂着喀什噶尔方言。²40岁的商人Rahim Ad-din djan出生在安集延，但是几乎在喀什噶尔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识字的他为雅林讲述了2首诗歌。

第三卷包含了13个民间传说或故事，29首诗歌、27个谚语、5个谜语。卷三中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主要由1900年出生于皮山的农民Maqsud hadji提供，识字的他曾在当地的经学院学习。

维吾尔族商贩、驼夫、商人等作为雅林的调研对象，雅林分别对这17个报道人进行了访谈。就这17个报道人的自身情况来看，他们年龄不同，职业各异，多数为目不识丁的普通群众，反映了雅林所采访群体的特殊性。从17岁的维吾尔族少年到40岁的中年人，驼工的职业不仅折射出当时驼队贸易的繁荣，而且也表明了维吾尔人善于经商勇于外出谋生的勇气。这些资料提供者都能讲出不少维吾尔族民间传说和谚语等，可见口头文学在维吾尔族中的丰富性。总观雅林译本中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故事和传说有头有尾，结构较为完整，可知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是民众耳熟能详的，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言说，对他们的生活影响较大。此外，个别有文化的维吾尔人还提供了维吾尔族生活的地理环境、自然风貌、农业、教育、饮食、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集中体现在第四卷中。两个长居喀什的外国人所讲述的内容，雅林将其分类到喀什维吾尔族民间文学文本中，且该部作品为《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可以推断出这两个外国人所讲内容与维吾尔族传说故事有关。如此丰厚的四卷集作品，不仅从侧面反映出来自塔里木绿洲南部的报道人当时有充裕的闲散时间接受雅林的访谈，同时也表明雅林具有智慧的访谈艺术与田野调查技术，值得现在的研究者借鉴。

（二）科学记录

一九一八年北大展开歌谣征集活动，学者们将目光转向民间，学术研究也回到乡土。北京大学开展的歌谣征集运动对田野作业提出了基本要求，即忠实记录：“歌谣文俗，一仍其真，不可以加以润饰，俗语不可改为官话。”除了忠实记录外，还要求附记流传情况。有关历史、地理和有关风物的注释等等，这是我国以科学方法搜集记录歌谣的开始。³随着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的展开，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搜集活动也随之兴起。各行各业的人都加入到民间文学的搜集中，如

¹ 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

² Gunnar Jarring. Texts from Kashgar, Tashmaliq and Kucha (来自喀什和库车的文本) [M]. Lund: Gleerup, 1948, p. 4.

³ 钟亚军，王宁丽. 回族民间文学导论[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208.



文艺工作者、教育从事者、语言学研究者、历史学者、人类学研究者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从事民俗学、语言学、民族学研究的学者在搜集方法上，比较坚守忠实记录的原则。钟敬文在《关于故事记录整理的忠实性问题》一文中指出：“作为多种人文科学研究材料的民间故事、传说的记录，必须是按照民众的口头讲述忠实地记录下来，并且不加以任何改变地提供出去（当然，它必须经过一定的科学方法的整理过程）。即使原讲述中有形式残缺或含有显然错误的内容等，也不要随意加以删除或改动。最好把对它判断和取舍之权留给它的各种研究者。”¹

除了忠实记录的原则外，钟敬文认为：对于作品里的一些方言土语，或需要指出社会、历史背景的地方，就得给以注释、说明（这些各种，在上述的科学资料的整理上，同样要这样做）。²瑞典学者雅林在搜集中采取的忠实记录的方法与北京大学歌谣运动提出的田野调查原则相吻合。雅林在其田野调查过程中，不仅使用维吾尔语记录了讲述者讲述的故事和传说，而且还记录了讲述者的个人信息。雅林的记录较细致，但遗憾的是，雅林没有对当时采访者与访谈对象之间的互动情形、讲述者的讲述情景以及语气表情动作等做记录。

在《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部分，每页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拉丁文转写后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位于每页的上端，下端为逐字逐句对应的英文翻译，页面底端有注释。雅林逐字逐句的拉丁文转写，每一句拉丁文对应一句英文。此外，雅林在页面下部用注释的方式对相关内容所做的详细解释和说明，表明雅林在田野考察中严格遵守忠实记录的原则。四卷集作品中的注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对某些词的发音和意义进行说明，如单词“toqach”的意思是含有油脂的生面团做成的一种面包³；雅林个人对某些作品细节的思考，如根据故事情节做出的猜测⁴；对讲述者语调语气的注释，如在《The tale of the man with forty sons》中有一句为“O, a woman”，此处雅林特意强调长元音 a:h，他的注释表明讲述者在讲述过程中的发音特点。雅林的注释部分既有来自自己的田野调查，也有对无法准确翻译成英文的诗歌的说明、一些英文单词对应的维吾尔语、表达自己对某些语音和词汇的看法、某些诗歌格式所引发的个人思考等。雅林文本中页面下端的注释不仅是其忠实记录原则的说明，也是他严谨学术态度的证据。

除注释外，雅林还对其中一些作品的内容进行了补充。为了确保材料的本真性，雅林将补充内容放在文中的括号内，以此将补充内容与原始材料区分开，这亦是雅林忠实记录原则的体现。为了使读者清楚对话的人物，雅林根据人物身份做了补充，如在《头癣者和王子的传说》中就有“he(the prince)said, O, Shep!”⁵为使故事内容较准确，雅林根据故事中主人公的职业对故事细节做了说明，如在《狐狸和牛奶罐》这个故事中“The wood-cutter went to the jungle, put the jug under a tamarisk and began himself to take (cut down) wood from a hill”⁶的补充内容；因文化表达不同而做的补充说明，如《三兄弟的传说》中“he prayed much for his small (youngest) child”⁷。为了读者阅读的连贯性，雅林根据故事发展顺序填补了诸如 thus、therefore、and 等介词和连词，这些信息同样被置于括号内，以示区别。雅林在文本中的注释和补充解决了不同文化阅读者的阅读疑惑，也为研究者更好的进行研究提供了条件。

¹ 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藪[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320.

² 钟敬文.民间文艺谈藪[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321-322.

³ 根据维吾尔族的饮食特点,笔者认为此处为维吾尔人的食物油馕。

⁴ 正文为 Having taken a piece of the underboiled meat from the kettle and tied it to his loin.但雅林指出此处可能是 in the loin cloth.笔者思考后,认为雅林的推断是正确的,因为从烧水壶中取出一块未煮熟的肉放在腰间显然不合逻辑,经雅林推断后得出可能是放在腰布中,较为合理。

⁵ Gunnar Jarring.Texts from Khotan and Yarkand (来自和田和莎车的文本)[M].Lund: Gleerup, 1946, p.115.

⁶ Gunnar Jarring.Folk-lore from Guma (来自固玛的民俗学资料)[M].Lund: Gleerup, 1951, p.54.

⁷ Gunnar Jarring.Folk-lore from Guma (来自固玛的民俗学资料)[M].Lund: Gleerup, 1951, p.62.



三、他者贡献：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与诠释

雅林作为一个文化他者，对异文化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进行了搜集、整理、翻译与研究，并将我国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译介到国外。相比其他探险家对新疆的各种描述性作品而言，雅林在为国外读者提供维吾尔族民间故事、传说、诗歌作品的同时，也为国内和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资料，从文学的角度向外界介绍了新疆，介绍了维吾尔族。作为传播中国文学的跨文化学者，著名专家葛玛丽女士高度评价了雅林，她指出雅林研究主要在维吾尔语音和民间文学方面，他的著作向西方人欧洲人提供了维吾尔资料，介绍了新疆特别是喀什的情况。¹在克什米尔地区进行田野访谈时，雅林与讲述者之间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基础上完成的调研，四卷集的《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就是其跨文化交流的成果。

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跨文化交流成为全球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跨文化交流不仅体现在语言、人际交往、贸易等方面，文学交流也是跨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其中不同语言的文本则是跨文化文学交流的具体承载物，文学交流过程是高层次的跨文化交流。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文本既充当了跨文化交流的媒介，也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可能。雅林英译本中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就是跨文化文学交流的最好例证，他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原始资料，吸引不同文化体系的民众进行阅读，同时也吸引不同学科背景的国外学者进行研究，甚至吸引着国内学者的目光。如一些学者就其中的维吾尔语进行了研究，学者 S. WURM 认为：“雅林出版的两卷来自新疆南部的文本，在口语上提供了最珍贵的材料，有助于以现代可靠的语音翻译方式满足突厥语方言文本的迫切需求。第四卷中的民族学材料可能也是人类学家感兴趣的。”²Abdurishid Yakup 对四卷集中有关和田和皮山的维吾尔语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固玛维吾尔语的多样性表现出其具有独特的语音和语法特征，可以从多样性的和田维吾尔语中看出。因此，雅林有理由认为固玛口语与和田市所说的维吾尔语不同。这个可能是雅林把固玛材料单独作为一卷出版的原因，目的是将其与来自和田市的材料分开。”³

笔者认为四卷集的《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不仅是研究塔里木绿洲南部维吾尔族语言重要材料，也是研究南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可靠资料。雅林将大量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英译本中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种类繁多、内容古老而有趣、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意象、渗透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观和价值观等。如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的叙事长诗《塔依尔与佐合拉》，既在我国境内的喀什、和田、库尔勒、伊犁、哈密等地被人们口口相传，也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以及中亚的一些地方广为流传。这个故事存在于我国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但相对而言，维吾尔族中这个故事的版本较多，而雅林文本的《塔依尔与佐合拉》故事的非悲剧结尾为该故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又如“头癣者”的系列故事⁴，这四则故事从不同方面对主人公“头癣者”做了叙述，在这四个故事中，“头癣者”具有聪明、狡诈、狠毒、偷盗等特点。通过查阅资料笔者得知那时南疆有很多“头癣病”患者，现在该疾病依然危害着人

¹ A. von Gabain. Literary texts from Kashgar. 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glossary by Gunnar Jarring (贡纳尔·雅林翻译的带有注释与词汇的喀什噶尔文学作品) [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ew Series), 1980, 114 (1), pp. 61-62.

² S. Wurm. Gunnar Jarring. Folk-lore from Guma. Ethnological and Historical Texts from Guma (贡纳尔·雅林收集的固玛民俗学、民族学和历史学资料) [J].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54, 16 (1), p. 195.

³ Abdurishid Yakup. "The Khotan Varieties of Uyghur as Seen in Jarring's Transcription" (雅林抄本中的和田维吾尔语变体) [A]. Ildikó Bellér-Hann, Birgit N. Schlyter, Jun Sugawara (eds.). Kashgar Revisited: Uyghur Studies in Memory of Ambassador Gunnar Jarring [C]. Leiden, Netherlands: Brill, 2016, p. 87.

⁴ 这四个故事分别为来自和田的《一个头癣靴匠学徒的故事》、《头癣者和王子的传说》、《一个头癣者的故事》；来自喀什的《一个头癣者的故事》。



们。而在维吾尔语中，“头癣”¹具有懒惰、不诚实、贫穷、难看等一些类型的象征，在维吾尔族中还有专门的谚语，如“秃子打扮停当，礼已经散场”、“天鹅爱的是湖水，苍蝇爱的是秃子”、“秃子头上不让苍蝇落，苍蝇不让秃子得安宁”、“给秃子梳子，他还要树胶”、“秃子进城，专找坏消息”。这些故事反映了早期维吾尔族人的文化心理，是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写照与心灵声音，值得深入研究。除了民间故事和传说外，雅林文本中还有丰富的谚语、谜语和绕口令，如谚语“An old coat is good in rain, a bad relative is good when dead”²，翻译成汉语是“一件旧衣服在雨天是好的，一个坏亲戚在死亡时是好的”，这表明了维吾尔族人对坏亲戚的态度；如谜语“It goes and goes and never is able to leave its track. What is that? A cotton cleaning machine.”³既“它一直走着，永远无法离开它的轨道。那是什么？一辆清棉机”，这个谜语可能来自棉纺织工业者，也能约略体会到维吾尔族棉纺织工的勤劳和辛苦；绕口令“White cattle black cattle”⁴，字面意思是“白牛黑牛”，用维吾尔语来说这个绕口令，可能更富有趣味。雅林文本中的维吾尔族诗歌数量众多，如下面这首爱情诗表达了维吾尔族男子对自己所喜爱姑娘的深情。在男子眼中，他那燃烧着的深情的爱如黑色的灰烬，这是姑娘眉毛呈现黑色的原因，但姑娘似乎心有所属，并未给男子以回应。从侧面暗示了男子炙热的爱在燃烧以至于燃烧成灰烬却得不到喜爱姑娘的回应，委婉的表达了男子痛苦失望的心理，诗歌如下：

她黑色的眉毛是白昼，
她并非涂抹了奥斯曼⁵。
我深情的爱为你燃烧，
你的爱并非为我燃烧。⁶

四、结语

雅林对塔里木绿洲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译介既丰富了我国的民间文学，也将我国的民间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扩大了我国民间文学的影响力。对维吾尔族人而言，雅林是“他者”，而对雅林而言，维吾尔族人则是“他者”，这种“自我”与“他者”的转换，在雅林的研究中并未出现“二元对立”的情形，而是相对平和的状态。这与“他者”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⁷不同，值得研究者在面对不同文化时进行思考并学习。物质文本《新疆南部维吾尔语知识资料》的讲述者多为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不论年龄大小，知识多少，他们都能完整的讲述不少有趣的民间传说、故事、诗歌、谜语等。可见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存在于平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民间文学丰富性的体现。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一个视野，是民众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视野。⁸文学源于生活，不同的研究者对雅林文本中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不同诠释的文学解读，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方式，而雅林则为学者们提供了跨文化交流的资料。不仅如此，雅林的田野调查方法及其忠实记录原则也值得学者们参考借鉴，他对我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尊重值得重视并深入研究。

¹ 头癣的维吾尔语是 ڧى، 常翻译为秃子。

² Gunnar Jarring. Texts from Khotan and Yarkand (来自和田和莎车的文本) [M]. Lund: Gleerup, 1946, p.120.

³ Gunnar Jarring. Folk-lore from Guma (来自固玛的民俗学资料) [M]. Lund: Gleerup, 1951, p.130.

⁴ Gunnar Jarring. Texts from Kashgar, Tashmaliq and Kucha (来自喀什和库车的文本) [M]. Lund: Gleerup, 1948, p. 137.

⁵ 奥斯曼，俗称“乌斯曼”，是一种绿色野生植物，维吾尔女性用该植物的汁液涂抹眉毛，不经能使眉毛又黑又长，而且能促进眉毛生长。

⁶ Gunnar Jarring. Folk-lore from Guma (来自固玛的民俗学资料) [M]. Lund: Gleerup, 1951, p. 119.

⁷ 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J]. 外国文学，2011（1）：118.

⁸ 施爱东著. 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9.

